他们的“特权”是带头牺牲

□ 刘 波

抗战时期，在敌后战场有大批的中共将领浴血沙场，为抗日战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仅八路军就牺牲团上干部669人，其中旅以上干部牺牲102名；新四军有350个团以上干部牺牲，其中旅以上干部牺牲人数有45人。而抗战时期，无论是中国军队还是日本军队，旅以上干部通常可授少将军衔，有的甚至可授中将军衔。可见，敌后战场牺牲的中共将领远不是一些人认为的那样仅左权将军一人。

正是有大批带头牺牲的共产党将领，在敌后严酷的战争环境中树立了人民军队高级干部可敬可爱的形象，才赢得了广大指战员和老百姓的衷心拥护和信任，从而弥补了武器装备的严重不足，使“兵民是胜利之本”有了可靠的源泉。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联、华南抗日游击队等各路兵马，才能从全面抗战初期的数万人，迅速成长壮大为一百多万人的抗日雄师，最终打出了敌后战场的威风和辉煌。回顾为抗战牺牲的那些人民军队的将领，我们不难发现他们身上往往留下这些闪光的宝贵品质：

战斗时冲锋在前。在敌后，抗日武装面临日军拉网式、梳篦式的“扫荡”、“清剿”，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而当领导最大的“特权”，就是随时带头牺牲。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在1942年5月的反“扫荡”中，指挥八路军总部机关突围，他本可以迅速撤离，但为指挥部队突围，他不顾个人安危，也不躲日军的轰炸，中弹牺牲。这一义举被陈毅称赞为“义烈忠勇，震栎古今”。

1941年11月新四军第六师第16旅在塘马战斗中，旅长罗忠毅、政委廖海涛为掩护部队突围，带领战士们消灭日军300余人，两位旅主官却同时阵亡牺牲。作为领导干部，他们在战场上所用的“特权”仅仅是带头冲锋陷阵，生死关头，把生存留给部下，把死亡留给自己。这是何等宽广的胸怀，何等高尚的品质！

当领导就是带头吃苦。陈毅赞扬的新四军一些牺牲将领颇具代表性，他说：“如胡发坚、罗化成同志等若干人，皆出身工农，来自田间，奔走革命，无问生死，恶衣非食，不择居住，更无任何薪俸之酬劳，不计身家之挂累。”“断头流血以确保革命大业于不坠，其大节之不可横夺，气慨之不可凭陵，以视古昔仁人志士，其操心之危，虑患之深，死事之勇，殆有过之无不及。”“本军将、校、尉、上、中、下士之生活待遇皆处于同一生活水平，无苦乐悬殊之绝对差等。”

当年人民军队的不少抗日将领之所以为将，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带头艰苦奋斗，甚至到了冻死、积劳成疾而死的地步。除抗联牺牲的烈士杨靖宇等人外，新四军中的典型如第二支队政治部主任罗化成，他因冻致病而死。陈毅为此大为感叹：“新四军是一个衣服不全的军队。新四军是一个吃饭不饱的军队。新四军是一个缺医无药的军队。新四军又是一个游击任务艰苦，作战境地困苦，毫无人员补充的军队。罗同志等的冻馁而死，就可作为新四军为民族国家尽心竭力始终无愧的铁证！”

领导职务能上能下。红军改编成八路军、新四军后，由于国民党给的编制仅仅限于3个师和一个军。一些过去担任师职，甚至军职的领导，也只能降职使用。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如，在长乐村战斗牺牲的129师386旅772团团长叶成焕，本来在红军时期是师政委，却因编制所限，降为团长使用，为了抗战大计，无怨无悔，工作热情丝毫不减。在连云港附近的小沙东海战中牺牲的新四军第3师参谋长彭雄，在红军时期本是师参谋长，新四军组建时降为团参谋，以队伍壮大后再升为师参谋长。

为大义不惜慷慨赴死。人们都熟知杨靖宇被捕前拒绝投降对一个山民说的那句话：“老乡，我们都投降的话，还有中国么？”抗战中像他这样的中共领导干部还不少。如，晋西北军区副司令员续范亭，曾于1935年参加国民党五大时，在中山陵悲愤地写下了《哭陵》，对国民党的不抗日愤而剖腹。再如新四军巫恒通弹尽援绝卒至被俘后，拒不食敌寇水米。拒绝旧友亲朋劝降，绝食凡十四日而气绝，死节之惨烈，抗战以来所仅见。一个军人的血性如此，使敌人也不得不为之叹服低头。

这就是当时人民军队领导干部一心为公、朴实无华的本色，以及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形象，这也是人民军队战斗力生生不息、迭挫强敌的奥秘之所在！

流民图

为民写生 勿忘国耻

□ 姜天骄

作者蒋兆和

1937年北平刚刚经历了七七事变。在蒋兆和北平的家中，他满脑子都是中华大地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痛苦场景，种种不平与愤懑使蒋兆和产生了构思创作《流民图》的强烈冲动……

这是话剧《蒋兆和》的一个场景。作为20世纪中国现代水墨人物画的一代宗师，蒋兆和的画笔下，从来只有衣衫褴褛的穷人。这是因为，对战争的痛恨与控诉，对劳苦大众的同情与无奈，对民族未来的思考与希望，才是他创作的动力和灵感。

话剧舞台上，蒋兆和的故事正在继续：这一天，宋文带着许萍来到画室给蒋兆和做写生模特儿。许萍是“九一八”事变后从沈阳逃难到北平的学生，她全家人被日寇杀光，眼泪已经流尽了。蒋兆和的画中需要一位流泪母亲的形象，他让宋文轻轻唱起了歌曲《松花江上》，听到如泣如诉的歌声，许萍泪流满面，蒋兆和也在悲愤的激情中写生！后来，宋文帮蒋兆和找来了更多的模特儿：车夫、搬运工、逃难的人、学生……

《流民图》是蒋兆和融汇中西的巨制，他通过塑造101个难民形象，直指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表现画家对战争的愤怒，对正义、和平的呼唤，为现代中国水墨人物画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艺坛上确立了不可取代的地位。

话剧《蒋兆和》就是从他“君住长江头”、“识珠”、“烽火画像”、“沥血《流民图》”、“太庙展画”、“琴瑟和鸣”、“失画”、“劫后余生”、“愿与君子共和平”等片段讲述了他坚持为民抒写、为民抒情、为民抒怀的艺术人生，让观众从他的人生经历中理解他为什么能够创作出不朽画作《流民图》。

上世纪五十年代，蒋兆和在家中作画。两个女儿问父亲为什么画册中都是些穷苦人？孩子的话使蒋兆和再次追忆起了往事……

1922年秋，四川泸州的长江码头上，16岁的蒋兆和告别家乡和二叔，凭着自学的绘画才能，来到上海打拼。几年后，蒋兆和结识了画家徐悲鸿，对水墨人物画的共同追求，二人建立起了“亦师亦友”的深厚友谊。

1932年初，淞沪抗战爆发，蒋兆和参加临时青年爱国宣传队，并应邀给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画像，以此鼓舞抗日军民。在前沿阵地指挥所，蒋兆和怀着无比复杂的心情，以画笔作刀枪，和抗战军民战斗在一起。

《流民图》的命运同样波折。《流民图》在北平的太庙展出后，被日本人勒令禁展。蒋兆和又带着这幅作品到上海法租界展出。他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流离失所的民众所承受的遭遇。然而，在法租界，《流民图》被当时的一个银行家带人强抢，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只能黯然回到北平。直至解放初，在上海的一家仓库里，才发现了仅存半卷的《流民图》，友人专门带回北平还给蒋兆和。

1985年，泸州市政府决定把《流民图》制作成大型石雕，镌刻在玉蟾山上，让《流民图》与山河同在！蒋兆和兴奋异常，端起酒杯，吟诗一首：“少小离家未得归，蹉跎岁月八十余。梦中常饮家乡酒，期与乡邻共举杯！”

话剧由此落下帷幕，但蒋兆和先生对苦难百姓的悲悯之心，爱国爱民的火热情怀仍然激励着后来人不要忘记历史，珍惜和平，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卢沟桥事变的亲历者郑福来

这段历史会一直讲下去

□ 余 颖

84岁的郑福来耳不聋、眼不花、背不驼。他利索地爬上台阶，走过卢沟晓月碑，站到了卢沟桥坑坑洼洼的桥面上。

“老爷子来了，你们快去听他讲卢沟桥事变。”桥头小贩认出了他，连生意也不顾了，催促正在挑选小挂件的学生游客赶紧过去。十几个北京理工大学的学生呼啦一下，把郑福来围在了桥上的石狮子旁。

“好，我就爱给学生们讲！”郑福来更精神了。顶着烈日，衬着蓝天白云，老人又一次讲起了70多年前的亲身经历。

“日本鬼子的暴行，我从未遗忘”

作为七七事变的亲历者，虽然当时年仅6岁，日军的暴行依然震惊了郑福来，从未遗忘。

他记得早在七七事变之前，日本人就借着打靶的名义在河滩上练兵，附近的孩子们都捡到过弹头。当时国民党政府不愿与日军爆发冲突，只守着城门不让日本人进宛平城。学校停课、买卖关门，居民们对日军又恨又怕，也没有办法。

1937年7月7日夜，密集的枪炮声把郑福来从睡梦中惊醒。“我睁开眼一看，外面黑洞洞的。”郑福来回忆说，炮弹就在自家北房西边落下爆炸，据说第一炮把县政府大厅都打塌了。

第二天一早，郑福来得知头一天还在一起玩耍的10岁小伙伴四春子，被落到自家门前的炮弹炸开肚子，抢救无效死亡。

战斗持续了很多天，宛平城里到处都有炮弹落下。“房子都被震漏了，实在没法待了。”郑福来跟着母亲，混在人群里逃难。逃到长辛店附近的小树林时，郑福来看到里面全是一排排的尸体，有人告诉他，这是牺牲的29军战士。他们不敢停留，一路逃到固城。

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当时身在异乡、没吃没喝，郑福来的母亲作出一个冒险的决定：回家。“回家的路上，铁路沿线全是尸体，有时候把路都堵了。”郑福来说，他和妹妹、表弟几个孩子手牵着手，大人让他们闭着眼睛走路，千万别看。由于年龄小、好奇心强，郑福来还是睁开了眼睛。“成堆成堆的死人，男女老少都有，有的还被开膛破肚，全是被日军杀死的！都是无辜百姓啊，鬼子太可恨了！”讲到这里，老人嘴角都有些颤抖。

回到家里，郑福来发现，自家三间灰土房的门窗没了，房子被炮弹炸没了顶，奶奶、爸爸、伯父、伯母不知道逃到了哪里。家对面的岱王庙原是当年驻守在卢沟桥一带的国民党第29军219团团部驻地，那时也成了日军军营。

在那段日子里，国人的性命如同草芥，许多卢沟桥地区的村民都惨死在日本人手中。郑福来清晰地记得，在晓月碑亭后面，13人被日军集体杀害；吴振山的二叔经过日本岗哨没有给鬼子行礼，被一刺刀捅死；郭均的爷爷在河滩捡柴火时，被日军试新枪打死……

“日本鬼子到底杀了多少人，没人知道。”郑福来说，“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比强盗还强盗啊！”

“能活到100岁，我就讲到100岁”

郑福来家世代居住在卢沟桥西桥头，离岱王庙只隔了一条窄马路。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前，他经常能听见岱王庙里的国民党军队高唱“手握大刀，杀光日寇保家乡。”北平沦陷后，岱王庙变成了日本军营，郑福来又看着日军带着伪军出门扫荡，回来就听说哪里又杀了多少人，活埋了多少人。

直到1948年11月13日，一名解放军侦查员背着“小马枪”摸进了郑福来家，告诉他解放军要进城了。在郑福来心目中，这天就是宛平城的解放日。

郑福来不愿意那段血泪交织的抗战史也被遗忘，他抓住一切机会，向人们讲述自己看到、听到的一切。

1951年，20岁的郑福来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任卢沟桥镇镇长，接待了曾任全国政协常委的著名记者爱泼斯坦，为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外国党员讲述卢沟桥事变的经过和当地人的抗战史。

从那以后，郑福来就成为了卢沟桥抗战史的义务讲解员。退休后，他更是经常利用遛弯时间和节假日到桥上遛一圈，为游客们讲述卢沟桥事变的前前后后。60多年来，郑福来已经接待了超过70个国家的外宾、媒体记者和数以万计的参观者。

“我这么做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让中国人能牢记这段历史，让更多人能了解这段历史。因为日本到现在还否认侵华历史，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这是让老人最愤怒的事情。

2013年，一个日本人来参观，指着岱王庙问郑福来是什么地方？郑福来告诉他：“这曾是日军军营。我小时候常看到日本人排着队从这里出发，到处杀人。”那人说：“我们日本人不会无故杀人。”

“野狼到你家里撒野，强盗到你家里抢劫，你反不反抗？”郑福来毫不留情的反驳让那个日本人接不上话。他拍着自己的胸口说，“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我亲身经历，我就是历史的见证者，他们不服不行！”

正说着话，迎面走来两个扛着摄像机的年轻人。“别是来找我的吧。”郑福来自己嘀咕。旁边的人大声说，“就是来找你的！”果然，是广州来的记者。

最近每天都要接待好几波来访者，郑福来已经有点累了，但他还是一口答应下来。“只要来，我就配合人家。过两天还有个100多人的团队要来听我讲卢沟桥事变呢！”郑福来说，“有人来是好事情啊，可以帮着我把卢沟桥的抗战史传播出去。要是能活到100岁，我就讲到100岁！”

“卢沟桥事变报道第一人”方大曾在战场上失踪，多年来家人一直盼望——

舅舅回家

□ 梁 婧

“我没见过舅舅，听母亲说，在我出生前他就只身离家，到炮火连天的抗日前线采访去了。七七事变后不久就彻底断了音讯，从此再没回来。”70岁的张在璇是“卢沟桥事变报道第一人”方大曾的外甥，也是现在家里寻找失联亲人方大曾的主力。

“第一次知道舅舅的存在，是1950年随父母从上海回到北京协和胡同10号方家老宅时。”张在璇回忆，老宅前院的东南角立着一座碉堡样的小木屋，2米多高，4尺见方大，关上门里面不透一点光。木屋的“窗户”有两个凹槽，可以插上木板或红绿玻璃。孩子们想去玩，外婆发现后很生气，“这是你们大舅的东西，谁也不准动！”张在璇第一次知道，这小木屋是失踪舅舅冲胶卷、洗照片的暗室，是外婆的期盼，也是外婆的心病。

“舅舅是抗战初期活跃在国内的一位战地摄影记者，是许多报刊的供稿人，却在民族抗战如火如荼，个人事业刚刚开展的时候神秘失踪了。”方大曾是怎么失踪的？失踪前他都做了些什么？张在璇试图从外婆、姨妈和母亲的讲述里，拼凑出一个完整的舅舅。

1937年七七事变枪响，当时正在北平家中休假的方大曾得到消息后，决定马上前往卢沟桥。他整理了相机和胶卷，带着简单的行李，与母亲和妹妹匆匆道别便上了路。7月10日，方大曾终于抵达事发现场，并第一个报道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写出长篇报道《卢沟桥抗战记》，洗印了卢沟桥、长辛店被日军轰炸后惨状的照片，向全世界揭露了日军的恶行。同时，方大曾也在这硝烟与炮火中，无声地度过了自己的25岁生日。

张在璇的姨妈方澄敏回忆，方大曾在采访卢沟桥事变时险象环生，曾多次被日本兵拦下，要求检查。因他个子高，又长得一头“斯拉夫型”的黄头发，加之遇事冷静，并拿出了印有英文的“中外新闻社”记者名片，大概是“外”字吓住了日本兵，居然得以脱身，返回北平发稿。

1937年7月23日，方大曾带上家中存留的40个胶卷，告别家人，又风尘仆仆地上路了。之后，家里人只能从报纸上了解他的行踪。母亲方淑敏告诉张在璇，那时他们在上海，父亲每天下午回家都要带回一份《大公报》，看舅舅去哪了，在干什么。

1937年7月到9月，方大曾的晋、冀抗日前线战地通讯、照片不断。9月17日和25日，方大曾的名字在《大公报》上也能看到。但自1937年9月30日《大公报》刊出《平汉北段的变化》后，约有一年的时间，报纸上再也看不到方大曾的任何报道，一家人有了不好的预感。

通过多方打听，一家人辗转找到已搬至武汉的全民通讯社询问。据称，社里早已与方大曾失去联系多时，就连与方大曾关系最紧密的革命新闻工作者也不知道他的下落。方大曾就这么消失了。

家人开始整理方大曾留下的东西，企图从蛛丝马迹中发现亲人失踪的线索。除了协和胡同里的暗房，据方澄敏回忆，方大曾留下了一个背包，一只旅行箱，40个胶卷和2个放底片的小木盒。这近千张底片，全是卢沟桥抗战之前拍摄的，而离家之后的大量战地照片，随着他的失踪，也无从查询。有些散见当时的报刊杂志，大多毁于战火。

1947年，方澄敏从重庆回到北京协和胡同的老宅，这时距离方大曾失踪已过去了10年。院子里又盖了几间房，显得拥挤了许多，但暗房还在，里面摆放了一些杂物，装底片的2个盒子也只剩一个了。“姨妈为了保存这些照片，付出很多，尤其在动乱年代。”张在璇说，“姨妈总是抱着盒子念叨，‘这是全家人的念想，必须保存好’。”

“外婆去世后，母亲和姨妈接过了寻找舅舅的重担，几十年来一直在搜集他的资料。后来她们年纪大了，眼睛花了、耳朵聋了，这个重担就落在我们的肩上了。”张在璇说，对于舅舅的生死，家人仍保存着一线希望。盼望能打听出他的下落，知道他过得好不好。梦想着有一天他能回到这小院，回到协和胡同10号，那散发着枣花香的家。